

“中国化”快闪：流动空间的 机制重构与认同转化

杨光影

【摘要】快闪可视为国外青年基于虚拟社区形成临时性群聚，以此介入公共空间、抵抗主流文化秩序的亚文化活动；中国语境下，快闪活动完成从抵抗到建设的范式转换与再建构。“中国化”快闪的范式建构始于空间实践的机制重构，成于身份认同的类型转化。就机制重构而言，“中国化”快闪将国外快闪的临时性群聚重构为计划性组织，并形成跨场域、跨媒介的空间叙事，将公共空间建构为展演空间和话题空间。就身份认同而言，“中国化”快闪将“抵抗性认同”转化为“合法性认同”，使快闪越出亚文化范畴，成为参与公共议题的重要方式，且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情时刻发挥建设作用。“中国化”快闪为青年亚文化的合理转化提供了样本。

【关键词】快闪；流动空间；抵抗性认同；合法性认同；青年亚文化

【作者简介】杨光影，四川美术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艺术传播、视觉文化、青年亚文化等研究（重庆401331）。

【原文出处】《文化艺术研究》（杭州），2021.2.38～4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网络空间中艺术传播的‘社区化’现象研究”（项目编号：18CH208）的阶段性成果。

快闪(flash mob)原本是国外青年扰乱公共空间、带有抵抗性的青年亚文化活动。近年来，国内主流媒体、有关部门所组织的主题快闪活动，引发不同群体的认可与参与，形成了具有建设意义的“中国化”快闪的新范式。2017年“五四”青年节前夕，各地青年在各级团委组织下，开展向“五四”致敬、为共青团献礼的快闪活动。此后，“快闪”成为青年群体在“五四”前后的“固定节目”^[1]。2019年2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央视新闻频道推出“快闪系列活动——新春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系列节目。2020年初，我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快闪活动以更加多样的方式延续，并在危情时期鼓舞人心。武汉宣布“封城”之后，人们在自家阳台组织另类快闪，自发齐唱国歌，高喊武汉加油、中国加油。3月18日湖北与武汉新增确诊、新增疑似、现有疑似病例实现“三清零”，人们在当晚组织阳台快闪，相互鼓励。疫情趋缓后，外省市援助湖北医疗队相继返回，武汉天河机场工作人员

及市民代表多次以快闪送行外省市援助湖北医疗队。此外，“中国化”快闪还传播到国外，如在疫情期间，意大利都灵组织“快闪撑中国”活动。

“中国化”快闪引发社会学、传播学、艺术学等领域的关注和初步讨论。对此，国内学者多以传播模式作为切入点，探讨快闪活动的媒介效应^①，鲜有学者从空间生产的路径出发，分析“中国化”快闪的范式建构。然而，基于空间实践机制的范式建构，是“中国化”快闪得以生成与传播的根本缘由。据此，本文以“流动空间”理论为支撑，试图从三个层面分析“中国化”快闪的范式建构：其一，从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出发，如何描述快闪活动的社会空间结构？这一问题的阐述将成为分析“中国化”快闪范式的基础框架；其二，基于社会空间结构的分析，描述国外快闪活动的空间实践机制；其三，从空间实践机制出发，分析“中国化”快闪的机制重构，进而分析其生成的身份认同及其意义。

一、“流动空间”:快闪活动的社会空间结构

快闪活动生成于网络空间结构中。如何描述这一空间结构,成为分析快闪活动范式的基础框架。对此,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家曼纽尔·卡斯特尔的“流动空间”概念具有一定的阐释力。

(一)“流动空间”是信息技术衍生出的新空间结构

卡斯特尔认为,信息技术范式引发社会组织、文化、制度的整体变迁。其中,虚拟符号跨地域流动形成新的空间结构,即“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2]505}。在网络社会中,“流动空间”成为主导的社会时空框架。从组织实践的机制讲,“流动空间”是资本、技术、政治精英主导、草根广泛参与的权力结构。^{[3]46-50}就空间结构而言,“流动空间”包含网络空间本体与延伸部分。“流动空间”的延伸部分指在物理空间的衍生及其对个体与群体空间实践的框架支撑。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流动空间”的延伸部分不断扩张,表现在移动设备能够让个人随时链接到网络空间。在此,“混合现实和增强空间的融合,移动性和社交性产生了一种混合现实”^[4]。由于快闪活动基于网络社区的沟通与组织,并延伸到物理空间,“流动空间”成为开展快闪活动的空间结构。

(二)“流动空间”运作逻辑支配快闪活动的空间实践

随着“流动空间”成为网络社会的主导时空框架,“流动空间”的运作逻辑成为包括快闪在内的个人或群体空间实践的支配逻辑。具体而言,“流动空间”的运作逻辑可以概括为相关性运作逻辑。作为资本、技术精英占据主导地位的权力结构,虚拟符号的流动并非随机性、碎片化,而是围绕一定议题进行联结。符号之间因共通议题联结起来,相互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仅因为议题的共通性变得相关。^[5]例如,我们运用搜索引擎进行关键词搜索,搜索的条目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仅仅因为共通的关键词变得相关。在“流动空间”中,相关性变为主导的运作逻辑。例如,网络社区围绕偶像、作品等共通议题建立起来,社区中的信息并无有机联系,而是围绕议题变

得相关起来。又如,智能算法技术将个人浏览的信息升格为议题,并围绕这一议题进行相关信息推介。“相关性”成为“流动空间”的主导逻辑,主要因为虚拟空间的时间性摆脱了物理时间的限制,成为非线性时间,它“既瞬间又永恒”^{[2]562}。由此,线性因果逻辑无法对虚拟符号进行高效组织,相关性逻辑则相对有效。

从理论源头看,相关性源于“根茎”“集合”等后现代哲学概念。事实上,无论是“根茎”还是“集合”都包含“相关性”的组织逻辑。在网络研究中,“根茎”被用来描述、YouTube等平台中草根建构个人粉丝社区形成的“无中心、异质和生成性”的整体形态^[6]。算法推荐不断对个人社区的议题进行归类,形成共通议题的个人社区的相关性联结。个人社区在不断生成中,相关性联结同样在不断运行。如果说“根茎”属于宏观结构层面,“集合”则是符号之间具体的联结方式。在德勒兹那里,集合“是一种多样性,由许多不同的术语组成,唯一的统一就是协同作用。它是一种共生,一种‘同情’”^[7]。在网络空间研究中,马丁·穆勒等人扩展了“集合”概念,揭示了“集合”具备“异质相关、生产力、动态性”等特征。^[8]这些特征实则描述了相关性逻辑的不同形态:异质相关是相关性以共通议题将不同符号联结起来;由于符号处于流动中,相关性的联结同样是动态的,且能够生产出议题的新内涵。

二、临时性群聚与抵抗性认同:国外快闪的活动范式

国外快闪活动始于2003年6月,由美国时尚杂志《哈珀》的高级编辑比尔·沃斯克发起。通过短信、电子邮件和博客的邀请,100余人聚集在纽约一家梅西百货的家具部门。他们声称是住在威廉斯堡仓库一个公社的成员,并反复向销售员询问是否有“爱情地毯”出售。之后,集结的人迅速散去。这种通过网络社交形成线下临时聚合、短暂占据公共空间的活动范型,比尔·沃斯克将其命名为“快闪”。^[9]“快闪”的参与主体多为使用网络社交的青年人。随着移动社交和虚拟社区的泛化,快闪参与者更多通过虚拟

社区组织活动,并使此类活动蔓延到欧美各国,比较典型的案例包括泰特美术馆的“无声迪斯科”、柏林火车站的“吹泡泡”活动等。由此,快闪活动“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和‘病毒文化’的物理化而被广泛讨论”^[105]。

由于相关性成为“流动空间”的主导逻辑,快闪活动的组织与实践必然受到相关性逻辑的支配。在这一逻辑下,国外快闪活动的范式可以概括为:基于虚拟社区的相关性联结,参与主体形成临时性群聚,进而形成“抵抗性认同”(resist identity)。

(一)从空间实践机制来看,参与主体基于虚拟社区的相关性联结形成临时性群聚

国外快闪活动的组织者通过推特、脸书等社交平台发布主张,这些社交平台包含围绕共通议题生成相关性联结的虚拟社区。虚拟社区研究者莱因戈尔德认为,虚拟社区是“足够多的人带着情感兴趣进行足够长时间的公开讨论,由此在网络空间形成人际关系的社会群体”^[106]。不过,在社交功能渗透到各个平台的趋势下,虚拟社区的边界开始泛化。无论短视频平台还是脸书、微博等社交平台,都声称自己属于“社区”平台。与论坛等传统虚拟社区相似,这些虚拟社区依然是以共通议题(主播、话题等)联结起来的社交网络结构。就快闪活动而言,组织者在社交平台发起主张,共通的议题联结其他社交成员,进而形成虚拟社区。同时,虚拟社区的相关性联结落实到物理空间的组织实践中,形成一种集体性的组织情境。只不过与传统虚拟社区相比,移动社交平台的社区往往更具流动性和临时性,而快闪组织者建构的虚拟社区也具有临时性。无论沃斯克发起的购买“爱情地毯”活动,还是泰特美术馆的“无声迪斯科”,活动主张形成的社区多是临时建构,形成相关性联结的参与群体。参与群体迅速介入和撤离公共空间,构成临时性群聚的实践形态。这种情境中,看似随机、偶发的活动,实则围绕成员认同的共通议题展开,形成相关性的实践行为。因此,尽管快闪活动的空间实践机制具有临时性,但这种机制并非P.格兰奇

等人描述的是随机的、无目的的。^[12]

(二)基于临时性群聚的机制,参与主体生成“抵抗性认同”

临时性群聚中,参与主体形成认可活动议题和临时集体的“虚拟社区感”,进而生成相关的身份认同。网络社区是独立的社区结构,不能比附物理空间的真实社区,衡量网络社区是否形成的关键参照是“虚拟社区感”的形成^[13];进而言之,“虚拟社区感”包括“共同的历史”“沉浸感”等要素^[14]。在社交功能日渐泛化的当下,构成社区的门槛降低,社区结构趋于临时性。在此状况下,“虚拟社区感”更多成为一种临时的群体归属感。这种群体归属感基于网络社交结构,在社交结构和活动的“群体规约化”^[15]中迅速形成。

国外快闪活动通常包含扰乱和打破公共空间既定秩序的主张,在此过程中,参与主体生成对抗既有规制和主流文化的群体认同,形成卡斯特尔所说的“抵抗性认同”^[16]。对于快闪活动的“抵抗性认同”,布莱恩·休斯顿等学者认为它继承了青年亚文化的抵抗性。^[17]“抵抗性”源于赫伯迪克等人提出的“风格的抵抗”,他认为“光头仔”“奇装异服”等视觉符号表征了20世纪60-70年代青年对主流文化的抵抗^[18]。例如,比尔·沃斯科发起的购买“爱情地毯”快闪活动,意在打破消费空间的固有氛围和常规的购买方式。另外,莫尔纳等人将快闪的抵抗性置于先锋文化活动的历史脉络,认为快闪活动是抵抗主流文化的先锋艺术的延续。^[19]实际上,彼时的先锋艺术以抵抗资本主义文化为主张,其中的参与者无不是青年艺术家。就此而言,即便将快闪活动视为先锋艺术,它依然和青年亚文化范畴中的抵抗存在密切相连。

三、从临时性群聚到计划性组织:“中国化”快闪的空间实践机制重构

在主流媒体和相关部门的策划和组织下,“中国化”快闪建构出新的空间实践机制,将国外快闪活动的临时性群聚转化为精心策划的计划性组织。尽管“中国化”快闪依然包含突然介入、迅速离开公共空

间的临时性,但这仅仅作为快闪的形式化表现,形式背后是参与各方的计划性组织。

(一)通过明确议题内涵、议题建构者与活动组织者相分离等方式,“中国化”快闪形成计划性组织

在“中国化”快闪中,议题建构者往往预先明确了主题内涵,以此作为计划性组织的基础。例如,在“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中,以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为核心,主流媒体建构出“祝福祖国”这一明确议题。以此为联结点,参与者迅速认同这一议题的内涵,从而保障活动的有序运行。在纪念“五四”100周年、致敬共青团的快闪中,各级共青团明确了“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的活动主题。相比之下,国外快闪活动的议题往往是一个主张或者一次号召,议题内涵充满弹性。在此,组织者力图让参与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行动力,达到扰乱既有秩序,抵抗主流文化的目的。例如,2003年7月,在意大利罗马,超过3000名快闪族入侵了一家音乐机构和书店。在鼓掌和散场之间,参与者花了几分钟询问员工一本不存在的书籍。“这些团体设法集体地搅动和引起公众舆论、兴趣和注意。”^[20]然而,这一活动的议题并无明确的意涵。相比之下,“中国化”快闪通过建构明确的议题,消解了国外快闪的“骚乱”^[21]效果。

在明确议题内涵的基础上,通过议题建构者与活动组织者的分离,“中国化”快闪活动形成看似临时、实则包含计划性的组织形态。在“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中,作为主流媒体的央视主要负责快闪的议题建构及活动的专题报道。至于活动的具体组织,主要由参与者所在的地方政府、工作单位等组织机构完成。例如,2019年初在成都宽窄巷子进行的“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该活动总导演是成都电视台的频道总监,“为了完美达成快闪活动的效果,现场组织了超过70人的团队,全台共百余人参与,共投入了61个机位完成拍摄”,“1月15日接到任务,1月23日正式拍摄”。^[22]又如,2019年“五四”前夕,福州五一广场举行的“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快闪活动,由团福建省委、团福州市委联合策划,组织了

各界青年代表和市民群众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的青年共计500多人参与。可见,快闪的参与主体是在组织机构的引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排演,有计划地介入公共空间。在公共空间中,演出人员作为活动的核心,展现出活动的有序性;围观群众作为参与者,进行有序地参与。由于“青春心向党”“祝福祖国”等议题的明确内涵,参与者能够迅速认知和认同议题,从而进入情境之中。同时,演出人员在公共空间的临时介入,也为其他参与者带来了偶发感,从而保留了突发迅速的行动特质。可以说,这种有序活动在临时与计划之间找到了微妙平衡。

此外,议题建构者与活动组织者保持议题的一致性,保证了组织活动达到议题建构者的预设期待。尽管议题建构者与活动组织者相分离,但活动组织者认可议题的内涵,并在议题内涵较为明确的基础上,进行对参与者的组织,由此,“快闪活动”并未出现议题传达方面的偏差。同时,“中国化”快闪基于活动组织者的线下组织,通过短视频拍摄延伸到网络空间。这种延伸理路的改变,保证了“中国化”快闪的计划性。与之相比,国外快闪活动以线上空间的组织为基础,延伸到线下空间,具有随机性。

(二)以计划性组织为基础,“中国化”快闪构成跨场域、跨媒介的相关性空间叙事

在进行活动的同时,组织者还会拍摄和剪辑快闪视频,并上传到社交媒体,形成比尔·沃斯克描述的在“传染性媒介”中的“病毒式传播”^{[10]5-6}。这种“病毒式传播”的模式被“中国化”快闪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借鉴,并转化为相关性叙事。

首先,在活动组织者与议题建构者既彼此分离又保持议题一致的情况下,组织者往往有意选择具有指代意义的公共空间,并以多个场景构成相关主题的相关性叙事。例如,沈阳的“我和我的祖国”快闪,在沈阳故宫、盛京大剧院等城市知名景点同时展开,由此生成的快闪视频,不仅成为单独的空间叙事,更联结成共通主题的相关性空间叙事。这种相关性叙事将都市空间中具有代表性的场所联结起

来,意指青年群体乃至整个城市的人民对于祖国的祝福。与之相似,在“纪念五四、致敬共青团”的快闪活动中,组织者选择上海陆家嘴、福州五一广场等代表景点,表达青年群体对于“五四”运动和共青团的敬意。

其次,相关性空间叙事不仅存在于跨场域联结,还形成于跨媒介传播的维度。主流媒体报道的快闪活动建构出此类活动的空间叙事范式,引导各单位、组织相关活动,并上传视频至网络社交媒体,形成活动的跨媒介叙事。一方面,主流媒体具有数量庞大的受众和权威性,人们能够接受和认同本次快闪活动,并构成相关性的空间叙事。另一方面,在主流媒体的引导下,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组织机构纷纷进行类似的快闪活动,并将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例如,基层单位以工厂车间为背景,组织相关的快闪活动并上传视频。如果说主流媒体播放的快闪视频,属于精心组织和精良制作的“优质图像”(rich image),那么基层的组织机构在网络社交平台传播的快闪视频,则属于草根性的“劣质图像”(poor image)。“优质图像”“劣质图像”是德国媒介理论家黑特·史德耶尔提出的一组概念,前者指主流媒体和大型影视传媒公司精良制造的视觉图像,后者则指草根模仿、转发和个人制作的粗糙低像素图像。在“优质图像”的传播效用下,“劣质图像”对其进行模仿与再传播^[23],构成了相关主题的跨媒介传播,形成了不同层级的叙事。

(三)通过计划性组织和相关性叙事,公共空间被重塑为展演空间和话题空间

如上所述,国外快闪活动搅动了公共空间的既有关系。如乔治亚娜·戈尔对“快闪舞”的分析,“快闪舞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它侵入了个人和集体的空间”,“迫使人们的认知发生改变”。^[24]这种“搅动”的行动效果也呈现于“中国化”快闪中。尽管在不同的公共空间,参与者展演的方式各不相同,但相似之处在于,这些活动都打破了公共空间原有的关系结构。例如,首都国际机场、深圳南站作为交通枢纽,其主要的关系结构为机场、铁路工作人员与旅客的

关系,快闪活动临时打破了这一关系结构,起到搅动公共空间的行动效用。

不同的是,“中国化”快闪的“搅动”并非单纯的扰乱,而是将公共空间重塑为临时的展演空间。在西方社会,快闪参与者力图通过搅动行为表达一定的立场,然而,搅动之后,参与者并未建构出新的公共空间,反而囿于为搅动而搅动的闭环之中。与此不同,“中国化”快闪通过计划性组织将公共空间转化为展演空间。具体而言,“中国化”快闪分为核心和外围两个展演层级。核心参与者是事先组织排演、参与演出的成员;外围参与者则是在公共空间围观并参与其中的人们。在活动过程中,核心参与者通过不同形式的演奏或演出,引发公共空间中参与者的观看和共同参与,由此将公共空间建构为临时的展演空间。由于核心参与者演唱的歌曲是大众耳熟能详的曲目,在核心参与者的引导之下,外围参与者很容易进入情境中,与核心参与者产生共情效应。同时,在不同的公共空间,核心参与者对歌曲的演绎形式不尽相同,例如,在“我和我的祖国”快闪中,首都机场的核心参与者是交响乐乐队的驻足演奏,与此不同,厦门鼓浪屿的核心参与者则是一边穿行街道一边演唱的合唱团少年。不同的演绎形式契合了交通枢纽、景点等公共空间的异质性,由此扩大了共同参与生成共情的效果,强化了展演空间的情感氛围。

与此同时,在相关性空间叙事的传播机制中,相关议题的展演空间被媒介化,形成人们热议的话题空间。这种媒介化形成于媒体融合的格局中,展开于电视媒介、纸媒、网络媒体等多个层级。首先,通过央视的报道,“纪念五四、致敬共青团”“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建构的展演空间,呈现于主流媒体和不同年龄、类别的受众当中,受到广泛关注。《中国青年报》等全国性纸媒及其他地方性纸媒对活动报道和解读,让传统媒介受众了解这一新兴活动。其次,在媒体融合的趋势下,主流媒体的网媒公众号不断推送相关活动,将系列活动在不同公共空间建构的展演空间发布到社交平台,形成广泛的讨论。例如,

在“人民日报”微博账号中,“天安门我和我的祖国”快闪视频一天内的转发点赞数超过2万。^[25]在社交功能泛化的状况下,这些快闪视频引发受众的评论与转发,同时引导更多的组织结构进行相关议题的快闪活动和视觉生产。

四、从“抵抗性认同”到“合法性认同”：“中国化”快闪的认同转化

在计划性组织中,“中国化”快闪的参与者逐渐形成新的认同。认同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26]同时也是多层次的,它包含人们对职业、阶层等方面的社会角色认知,也包含更高层次的民族、国家和文化认同。^[165]在卡斯特尔划分的认同类型中,除了“抵抗性认同”,还包含“计划性认同”“合法性认同”。其中,“合法性认同”指对主流制度和文化的认同。^[163]在“中国化”快闪中,国外快闪活动的“抵抗性认同”被转化为“合法性认同”,快闪逐渐成为青年群体乃至大众参与公共议题的重要方式。

(一)“中国化”快闪将国外快闪的“抵抗性认同”转化为“合法性认同”

以卡斯特尔对网络社会中身份认同的类型划分,国外快闪活动的参与主体属于“抵抗性认同”的范畴。西方快闪参与者旨在扰乱公共空间秩序,由此形成对主流文化制度和既有秩序的抵抗;与之相比,“中国化”快闪生成了参与主体对主流文化和民族国家的认同,将“抵抗性认同”转变为“合法性认同”,这种转变可以分为以下两个层面:

其一,快闪组织者通过计划性组织,将参与主体的“虚拟社区感”转变为快闪议题的认同感,以此作为“合法性认同”的构成基础。国外快闪活动中,组织者通过网络社交结构建立临时的虚拟社区。由于活动的议题内涵比较模糊,参与主体形成的“虚拟社区感”更属于一种临时群体归属感。与之不同,“中国化”快闪的组织者会明确参与议题的内涵,参与主体的“虚拟社区感”往往转化为对议题内涵的认可。由于议题内涵包含对于主流文化制度和国家民族的认同,参与主体对议题的认可成为生成“合法性认同”的基础。

其二,在此基础上,参与主体将扰乱行为转变为共情仪式,由此将“抵抗性认同”转变为“合法性认同”。在国外快闪活动中,“抵抗性认同”基于参与主体的虚拟社区感,形成于具体的扰乱行为,如参与者反复向售货员问询不存在的“爱情地毯”,打破商场惯有的购物行为。与之不同,“纪念五四、致敬共青团”“我和我的祖国”等快闪活动看似扰乱机场、车站、图书馆等公共空间,但其行为并未对社会制度形成扰乱和抵抗,而是落实到共情仪式的建构。通过组织者的计划性组织,核心参与者的演唱行为将快闪议题传播到公共空间,引导围观者进行这一议题的实践,并在歌曲的感染之下,形成共情仪式。以共情仪式为框架,参与者在组织行动和感情体验中生成对主流文化制度、民族国家的认同。另外,在相关性的空间叙事中,“合法性认同”蔓延于网络空间中。卡斯特尔认为,热情和恐惧是具有传播力的媒介情绪^{[21]46-150},共情仪式的再媒介化进一步扩大了“合法性认同”的传播范围。

(二)认同转化的意义在于,“中国化”快闪成为青年群体参与公共议题的重要方式

随着合法性认同的生成与传播,人们逐渐将“快闪”作为参与公共议题的重要方式。无论“纪念五四、致敬共青团”还是“祝福祖国”,应该说,这些“中国化”快闪的议题属于公共议题的范畴。随着合法性认同的生成,“扰乱”公共空间的“快闪”行动意指对公共议题的参与,而非对主流文化的抵抗。在此过程中,青年群体发挥引导公众参与议题的引领作用。如上文所述,“中国化”快闪一般存在核心展演者和观看参与者两个层面。从群体归属来看,其中的核心展演者一般都是青年群体。例如,在首都国际机场进行的“我和我的祖国”快闪,不同角色的参与者围绕核心展演者聚合在一起。作为核心展演者的青年通过演唱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演绎祝福祖国的议题。在展演者的引导下,围观者共唱歌曲,成为快闪活动的参与者,形成共情效应。在共情效应的作用下,展演者与围观者悬置了社会角色的差异性,在歌曲内容和情感的引导之下,参与者之间围绕共

通议题的相关性联结,生成民族国家认同。同时,展演者与围观者之间相互影响,形成民族国家认同的相互确证。在演唱过程中,唤起民族国家认同的参与者激动地流下眼泪。真情情感的流露,能够传达和影响其他参与者的情绪,从而形成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影响形成了共情效果,在演唱的共情仪式中,不同参与者之间形成了民族国家认同的相互确证。此外,活动组织者在演唱之前,提前准备和发放给围观者一面国旗。在演唱歌曲的过程中,国旗不仅成为凸显祝福祖国议题的符号,更是引发共情效应,唤起和确证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触媒。在此过程中,作为核心展演者的青年引发公众参与,在共情效应中引导观众共同参与“祝福祖国”公共议题。

同时,“快闪”青年形成参与公共议题的基本素养。这种素养既体现在对活动计划性组织的积极参与,还体现在计划性组织中的个体表达。参与主体借助指代角色认知的服装、场景,标出自己参与议题的社会身份,并将社会身份和公共议题有机联结起来。在服装方面,观众能够通过参与主体尤其展演者的装束辨认其社会角色认知。例如,小学生穿的校服和佩戴的红领巾,以及国企工人的工作服和安全帽,指代参与者的社会职业,海外唐人街华人身穿传统的戏剧行头则指代参与者的华人社区身份和族群认知。同时,参与主体选择的活动场景也能够意指参与者的社会身份。比如,国企工人进行的快闪活动,多在单位的所在地,甚至生产车间,这些场景呈现出参与者的员工身份。又如,清华大学的快闪活动在学校图书馆内展开,这一场景无疑标举出参与者的的大学生身份。通过服装展示和场景展现,“快闪”青年在公共议题中体现出个体的参与和表达。

(三)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化”快闪成为人们相互鼓舞、抗击疫情的重要方式

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化”快闪以另类的形式延续,引导人们参与到抗击疫情这一公共议题的行动中。尽管没有相关部门的计划性组织,但此前快

闪活动,培育出青年群体及其他公众参与公共议题的素养。在武汉宣布封城后,疫情的蔓延不仅危害人们生命,还导致心理层面的恐慌不安。封城期间,人们通过社交网络,组织参与到各家阳台举行的抗疫快闪之中。人们在齐唱国歌之后,高喊“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并感谢医务人员的努力。在危情时期,快闪在人们抗击疫情的过程中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如果说在“纪念五四、致敬共青团”“祝福祖国”的公共议题中,青年群体在“中国化”快闪中扮演的是重要甚至核心角色,那么在抗击疫情的另类快闪中,每个人都是活动的核心参与者。

在此过程中,快闪生成的“合法性认同”尤其是民族国家认同成为抗疫的精神支撑。在独特的“阳台快闪”活动中,人们所唱的是国歌、所喊的是“中国加油”。显然,参与者力图从“合法性认同”中找寻抗击疫情的精神支撑。这种精神支撑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民族国家认同在精神层面鼓励人们坚信能够战胜疫情。人们在共唱国歌的仪式中,确证民族国家认同。“非典”等历次灾难都未能击垮中华民族,人们在民族国家认同的感召下,相信民族和个体一定能战胜疫情;一方面,对政治制度和文化的认同支撑人们战疫的信念。在“中国加油”的喊声中,人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相信一定能够早日取得“战役”胜利,这种致敬表征了人们参与公共议题的素养逐渐成熟,也进一步强化了“合法性认同”。

结语

需要补充的是,“中国化”快闪不仅广泛传播于国内青年群体,还走向国际化,形成快闪活动的中国样本。2019年春节期间,“我和我的祖国”以及“一带一路”快闪已经在海外展开,并在“油管”(YouTube)等国外社交平台引起关注,但当时活动的参与主体依然是华裔青年和留学生。2020年初,当中国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在意大利都灵孔子学院和当地华人团体的组织下,当地青年和华裔、留学生一起,参加了“快闪撑中国”活动。当疫情在全球爆发之后,意大利的“阳台快闪”、瑞士的“晚九时鼓掌”等快闪活动

在危情时刻发挥了鼓舞人心的作用。可以说,如何将包含抵抗性的青年亚文化转化为建设性的社群文化实践,如何吸纳青年群体参与公共议题的新形式,“中国化”快闪为国内外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样本。

注释:

①学者多以传播机制为聚焦点,审视“中国化”快闪活动的传播机制。如余庆华:《短视频〈我和我的祖国〉传播特点及SoLoMo理论运用》,《电视研究》2019年第6期;姚会峰:《快闪报道的传播特色》,《视听纵横》2019年第3期。

参考文献:

- [1]佚名.“五四”青年节“快闪”活动青春上演[EB/OL].(2017-05-04)[2019-05-28].http://m.xinhuanet.com/2017/05/04/c_1120918102.html.
- [2]曼纽尔·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3]Csatells, Manuel. Communication Power[M].Oxford: Oxford UP, 2009.
- [4]De Souza e Silva, Adriana. From Cyber to Hybrid: Mobile Technologies as Interfaces of Hybrid Spaces[J].Space and Culture, 2006(August).
- [5]杨光影,刘娜.文化生产与审美生成:论网络社会中“流动空间”的运作逻辑[J].现代传播,2018(4).
- [6]Saeed, Saima. Negotiating Power: Community Media, Democracy, and the Public Sphere[J].Development in Practice, 2009(19).
- [7]Deleuze, Gilles,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M].New York: Columbia UP, 1987.69.
- [8]Müller, Martin. Assemblages and Actor-Networks: Rethinking Socio-Material Power, Politics and Space[J].Geography Compass, 2015(29).
- [9]Wasik, Bill. My Crowd or, Phase 5, a Report from the Inventor of the Flash Mob[J].Harper's Magazine, 2006(3).
- [10]Wasik, Bill. And Then There's This: How Stories Live and Die in Viral Culture[M].New York: Viking, 2009.
- [11]Rheingold, Howard.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M].Reading: Addison Wesley, 1993.
- [12]Grainge, Paul. A Song and Dance: Branded Entertainment and Mobile Promo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11(15).
- [13]Jones, Quentin. Virtual-Communities, Virtual Settlements & Cyber-Archaeology: a Theoretical Outline[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997(3).
- [14]Blanchard, Anita L., and M. Lynne Markus. The Experienced "Sense" of a Virtual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and Processes[J].ACM Sigmis Database, 2014(35).
- [15]Nora Ganim, Barnes. Mob It and Sell It: Creating Marketing Opportunity through the Replication of Flash Mobs[J].Marketing Management Journal, 2006(16).
- [16]曼纽尔·卡斯特尔.认同的力量[M].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17]Houston, J. Brien, et al. Urban Youth's Perspectives on Flash Mobs[J/OL].(2013-08-22)[2019-08-22].<https://www.tandfonline.xilesou.tup/doi/abs/10.1080/00909882.2013.825728>.
- [18]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M].陆道夫,胡疆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9.
- [19]Molnár, Virág. Reframing Public Space through Digital Mobilization: Flash Mobs and the Futility of Contemporary Urban Youth Culture[J].Space and Culture, 2014(17).
- [20]Van Rijn, N.. Invasion of the Flash Mobs[J].Toronto Star, 2003-08-05.
- [21]Bowler, Ann. Politics as Art: Italian Futurism and Fascism[J].Theory and Society, 1991, 20(6).
- [22]佚名.央视新春快闪打卡成都宽窄巷子[EB/OL].(2019-02-07)[2019-05-28].<http://sc.sina.com.cn/news/b/2019-02-07/detail-ihqfskcp3590154.shtml>.
- [23]Steyerl, Hito. In Defense of the Poor Image[J].E- Flux Journal, 2009(11).
- [24]Gore, Georgiana. Flash Mob Dance and the Territorialisation of Urban Movement[J].Anthropological Notebooks, 2010, XVI/3.
- [25]人民日报.天安门“我和我的祖国”快闪[EB/OL].(2019-10-01)[2019-12-08].<https://weibo.com/2803301701/19wrBhZhI?type=comment>.
- [26]Paul, James. Despite the Terrors of Typologies: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Categories of Difference and Identity[J].Interventions, 2015, 17(2).